

公木年譜

王广仁 周毓方 编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木年谱/王广仁,周毓方编著. —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6

ISBN 7 - 5602 - 1568 - 8

I. 公... II. ①王... ②周... III. 张松如—
年谱 IV. K 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8724 号

☐责任编辑:沙铁成 ☐责任校对:李震宇

☐封面设计:李冰彬 ☐责任印制:栾喜湖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130024)

电话:0431—5695744 5688470

传真:0431—5695734

网址: <http://www.nenup.edu.cn>

电子函件: Sdcbs@mail.jl.cn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吉林省吉新月历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幅面尺寸:140mm×203mm 印张:10 字数:240 千

印数:0 001—1 000 册

定价:20.00 元

前 言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

每当听到这首铿锵嘹亮的战歌，我们内心就油然浮现出那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著名的诗人、学者和教育家公木先生的高大形象。

公木先生的一生，始终是“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奋勇向前的一生。从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一天起，他就矢志不移地坚信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无论是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还是政治风波中的身心磨难，都没能使他对自己的政治信仰有过任何的动摇和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他又焕发了青春，在一个更高的境界上进一步确认了自己的政治信仰。这种信仰时时渗透于他的人生理想和学术思想之中，铸成了他完美的人品和文品。在大半个世纪里，他执著追求，战斗不息，谱写出一曲曲革命人生的壮丽诗章，成为一位真正“大写的人”。

公木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诗人。从开始创作诗歌起，他始终以生命为诗，以战士为本，坚持与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用自己真诚的声音与时代主旋律相共鸣。他的诗歌创作熔古典、民歌和新诗于一炉，在继承的基础上有创新，因此具有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和多样化的特色，易于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喜爱，具有久远的艺术生命力。他创作的三百多首诗歌为发展我国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诗歌创作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发布命令，确定公木作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这是对一位战士诗人的最高褒奖。

公木先生是著名学者。从青年起，他就从事学术研究，坚守不唯书、不崇古和不崇洋的治学之道。他治学领域广泛，态度严谨，学风民主，博采众家之长而又富于独创性，在中国诗学和古代哲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他提出来的“第三自然界”的理论加深了人们对诗歌本体和功能的理解。他用考古新发现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对《老子》等道家典籍进行深入研究，其论证的翔实、准确，深得海内外学者的肯定和赞赏，美、日等国的汉学家也曾多次前来研讨。

公木先生的大半生是在学校的讲台上度过的。从延安到东北，从长春到北京，从中学到大学，从培训职工到扶掖作家，他呕心沥血，培育了一批批、一代代学子和优秀人才。在长期的教育生涯中，他诲人不倦，有教无类，无论是权威人物，还是普通群众，甚至是中小学生，他都能同等对待，有求必应，有问必答。据初步统计，他曾为人作序百余篇，篇篇闪光；复函数百封，封封以诚，受到各界群众的一致赞赏，成为终生“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家，桃李遍地的一代师表。

使我们更为永志不忘的是，公木先生是我校的创始人。抗战胜利后，党中央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争取东北青年投身民

主解放运动，决定创办东北大学。在东北局的领导下，公木先生投身于我校前身东北大学在本溪的创建工作。建校初期，在解放战争的硝烟炮火中，他率领几百名师生，辗转东北三省，历经千难万险，才把校址定于长春。经过多年的辛勤耕耘和艰苦开拓，才为这座人民教师摇篮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现在我校正在为实现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研究型综合性师范大学的奋斗目标努力前进。我校能有今天，是与公木先生在学校创办和建设阶段作出的卓越贡献是分不开的。

我校正在准备迎接六十周年校庆，我们组织力量编写了这部《公木年谱》，作为向六十周年校庆的献礼，弘扬我校校史和校风、师风、学风，教育全校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让一代代人民教师为献身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永远向前，向前！

盛连喜

2005年2月

目 录

前 言	1
公木传略	1
公木年谱	21
后 记	309

公木传略

一

公木，学名张永年、崧甫，现名张松如，笔名公木，又名龚棘木、章涛、木农、席外恩、四名、魂玉等。他 1910 年农历五月十五日出生于直隶（今河北省）束鹿县（今辛集市）北孟家庄一个农民家庭。1917 年，在外祖父家的资助下，他入私塾读书，翌年转入村办初级小学。1922 年春，升入深泽县河疃高级小学。他的老师曹席卿是清末秀才，很有学问，虽然是位老人，却力主新学。曹先生献身教育工作，还不索报偿地让他的长子贡升、侄子俊升来校助教。俊升是新从保定育德中学毕业的，有革命的新思想。在他的指引下，公木在这里除了学习国文、英文和史地、数学、自然等课程外，还接触到《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白话文苑》、《白话书信》、《新潮》等书刊，打开了眼界，对国文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用白话文练习写作。公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接受启蒙教育的，受到了科学和民主思潮的熏陶，这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4 年，他以名列榜首的佳绩考入直隶省立正定第七中学。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4 岁的公木也满怀激情，

高喊“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参加了抗议五卅惨案的罢课、示威游行等活动。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学校内的党团员遭受迫害。共产党员高克谦同学惨遭军阀杀害，全校师生为他开追悼会，送的挽联是：“吴将军遭暗杀，高烈士又惨死，一地永埋双侠骨；太行山头名月，滹沱水上凄风，千秋凭吊两英魂。”这件事给公木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使他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激发了反帝爱国的政治热情。

在中学时代，公木各科学学习成绩均名列前茅，受到老师们的器重。在国文教师赵召德先生的热心指导下，他熟读了唐诗宋词，开始练习作诗填词，并以魂玉的笔名向报刊投稿，其中的《脸儿红》等被《大公报》副刊“小公园”和《晨报》副刊采用，这更激发了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兴趣，这就是后来公木说的“吾十有五而志于诗”。受时代潮流的影响，已是中学生的公木更倾向于新诗文。鲁迅、胡适、郭沫若、冰心、蒋光慈等人的作品都得到他的喜爱。在学校图书馆里翻阅到的《新青年》、《向导》和《创造》等期刊使他感到新鲜，开拓了一片新的天地。

二

1928年秋，公木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初入师大，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到学习上，在高年级同学王重民的帮助下读《论语》和《史记》，同时对高步瀛教授的唐宋诗和孙蜀丞教授的宋词选等课程深感兴趣。当时新文学界正在进行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他和同学们争相阅读钱杏邨的文学评论和蒋光慈的诗歌、小说。他后来回忆说：“就在这时，蒋光慈成为我们心中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大部分都曾背读过。”这一时期，北伐军打到了北方，迅速暴露出国民党右派与土豪劣绅互相勾结的丑恶面目，粉碎了在他幼稚心灵中的幻想。革命转入低潮，他的情绪非常郁闷，处

于上下求索的状态。1929年春，他写了一篇小说《孟老先生歪传》，讽刺国民党右派与封建势力的合流，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这时，他和孙志远、赵慎余、刘锡麟等同学经常在一起学习，白天分头读书看报，收集资料，夜间在教室里讨论中国社会的出路和发展前途等问题，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社。几个月后，这个秘密组织被师大党组织发现，并有意识地加以引导，遂使研究社的几位同学相继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0年初，经郝培庄介绍，公木和孙志远一起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师大医院的一间病房里秘密地宣了誓。不久，受共青团组织的派遣，公木在师大参加了北平左联师大分部成立的筹备工作，随后又在校内发起并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华北左翼教师联盟等组织。他还参加了北平文总的活动，在街头散发传单，在天桥、西单等地搞飞行集会等。同年8月，因参加庆祝长沙解放和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两周年，反对国民党军阀混战的示威游行，捣毁了国民党党部而被捕，被关押在北平警备司令部的监狱里。2个月后，政局发生变化，因晋军撤走而获释。从1929年到1930年间，他还以席外恩（C. Y. N.）、四名等笔名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诗作，还编辑过共青团的刊物《红孩儿》，写了不少宣传性的小故事、歌谣等，配合当时的斗争。从此，他在历史和现实的交叉点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确定了一生要走的文学道路。“首先是个战士，然后才是诗人”，文艺要为革命服务，成为他立人、创作的宗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公木全力投入救亡运动，曾主编过由社联领导的《麀尔》杂志（这是由党领导的北平大中学生学习马列主义的进步组织麀尔读书会秘密出版的刊物）。1932年3月18日，他因参加抗日救亡集会再次被捕，羁押在北平市公安局，一个多月后才由师大学生会和抗救会联名保释出来。当时北平的学生运动正处于高潮，公木出狱后便投入北师大的学生运

动。校长徐旭生辞职后，校政由学生会和抗救会主持。教联主办了师大暑期学校，公木担任文书主任。同年冬，鲁迅由上海回北平探亲，公木和王志之、潘丙皋以左联关系用学生代表名义，前往鲁迅家中拜访，同鲁迅先生就文学界的问题进行了亲切交谈。在聆听了鲁迅的教诲之后，他们提出邀请，希望鲁迅到北师大演讲。鲁迅欣然同意，于1932年11月27日到北师大向全校同学作了题为“再论‘第三种人’”的演讲。后来公木把他与鲁迅的这次会见写成《鲁迅先生访问记》，发表在1933年6月出版的北平左联机关刊物《文艺月报》创刊号上，署名为张永年。

1932年到1933年初，公木还与左联成员谷万川和王志之等同学着手筹办《文学杂志》。该杂志于1933年4月15日创刊，共出4期。公木在3、4期合刊上发表了两首诗歌（《父与子》、《时事打牙牌》）和一篇论文《新诗歌的内容与形式》。这是他从革命诗歌创作的最初成果。当时，文艺界正在开展由左联发起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公木在《新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一文中旗帜鲜明地针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我们要想创造为大众所了解，所爱好，因而更能鼓动大众的诗歌，我们便不得不利用为大众所熟悉，所喜悦，所易于接受的形式。也只有由这些形式的发展与改造，才能脱化出更新的形式来。不然，若只是企图着突然有一天由一个天才的普罗诗人，偶尔灵机一动，便创出一种崭新的形式来，这样热心的幻想家，正是没有了解伊里奇在《“左”派幼稚病》中所遗给我们的名言：‘左倾空谈主义，其立脚点是无条件地否认一切的旧形式。不理解新的内容通过一切形式而实现自己。’”“因此，在今日的中国，在新诗歌的现阶段中，我们主张：新诗歌的创作，一方面，要尽可能利用活在大众中的旧的形式；一方面，要极力创造能够被大众所了解，至少要能够被大众的前卫所了解的新形式。”无须解释，公木的这一观点是符合辩证法思想，合乎文艺发展的规律

的。《时事打牙牌》和《父与子》就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创作实践。前者利用民间流行的曲调（即旧形式），宣传红军的土地革命和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后者则是创造的新形式（自由体诗），反映了农村的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和新一代农民的觉醒与反抗斗争。

“文学是宣传”，对公木来讲，此时“已形成不容置疑的信念”，在创作实践上他也是这样做的。他在回忆自己参加左联后的文学活动时曾说：“我认为从事文学活动，就是革命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管搞啥，都是为了革命，这就是我当时的思想。我的文学基础虽浅，但方向非常明确。”“这种关于新诗歌的观念，一旦形成，便长期保持着，直到卢沟桥一声炮响，燃起了抗战的烽烟，我到了晋绥解放区，旋即调赴延安，作为一个业余诗歌作者，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他为宣传抗日而作的《时事打牙牌》曾在一二九运动中被广泛传唱。

1933年早春的一天，公木正在教室上课，一位同学悄悄地告诉他：“快跑，特务抓你来了！”原来，公木频繁的革命活动早已引起特务的注意，并上了黑名单。公木匆匆离开教室，与一位同学握着网球拍，假装打球，故意把球打到墙外，借去捡球，越墙跑了出去，回到河北老家。在家期间，在族叔的主持下，他与在高小读书期间结婚的妻子离了婚。不久，经北平教联介绍，他到山东滋阳县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去当教师。这所学校是培养小学教师的学校。公木教文字学、文学史等课程，还兼做班主任。校长比较开明，对公木等人的身份从不过问。公木在这里发展一批学生加入教联，建立了教联的鲁南支部，在鲁南几个县的小学教师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1934年冬，公木离开了山东，与乡师学生涂薪在北平建立了小家庭后，又回到自己的母校河北正定中学教书。因大学未毕业，又没有著作，按照规定不能教高中，于是他便把在山东乡师

写的文字学讲义整理了一下，并请黎锦熙先生审阅推荐，于1935年4月由新亚印书局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文字学概论》。在正定中学教书期间，发生了西安事变。他在学生中讲形势，作宣传，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注意，说他是学潮的幕后策划人。教育厅派督学孟扶堂来校调查。孟扶堂是公木的同学，对他说：“你赶紧走！”于是公木和夫人涤薪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白桦于1937年初返回北平，又在北平师大复了学。一家三口，生活无着，全靠同学互助度日。这时左联、教联等组织早已解散，他只参加了民先的活动。这期间，公木读了许多书，写了《白茶斋九歌注》，请罗根泽教授审阅书稿，准备出版，后来书稿在动荡不定的生活中遗失了，但这也显示出他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深厚的功底。

三

1937年，卢沟桥一声炮响，抗日战争开始了。北平沦陷后，公木经河北、山东、郑州辗转到了西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林伯渠同志让他们去延安，并说到延安可以教书。公木认为延安是后方，他要求到山西太原前方去，因为离开北平的时候，公木就曾和朋友们约定，这回要坚决“把自己交给民族解放的伟业”。为了实践自己的誓言，在救国志与骨肉情的尖锐矛盾中，公木夫妇毅然决然地把不满两岁的女儿白桦寄养在一位好心肠的回族人李宏塔家，然后轻装直赴山西参加晋绥军区工作。后来公木曾写过《弃儿记》，发表在丁玲、舒群主编的《战地》上。在晋绥军区，公木做过二战区动委会《动员》杂志编辑和由程子华同志任队长的敌后游击队的宣传股长。两个月后，他又被调到组织部工作，还曾到神池县、岚县等地任县或专区干部班主任、指导员。紧张的行军和繁忙的工作几乎使这位“业余诗人”没有了“业

余”，但是火热的战斗生活和动人的事迹又使他为之歌唱。这一期间，他除了宣传、演出、创作一些活报剧和小唱本外，还于1938年初创作了优秀叙事诗《岢岚谣》，成功地塑造了一位用计毒死日本侵略者并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农民英雄的形象。这首诗在诗艺上自觉地向民歌学习，在新诗的大众化、民族化方面作了成功的尝试。后来这首诗曾被改编成话剧，在抗大演出过。郑律成还为《岢岚谣》谱过曲。

1938年8月，为护送几位女同志回后方，公木西渡黄河，来到了延安，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了4个月。他在这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结业后，他被分配到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时事政策教育干事。新的天地，新的生活，使公木的创作热情又燃烧起来。翌年春，公木和酷爱音乐的朝鲜族青年郑律成同住在延安南门外西山坳抗大政治宣传科的一个窑洞里。有一天，郑律成偶然在公木的笔记本中发现了一首短诗《子夜岗兵颂》，便背着公木把它谱成了一首独唱歌曲，并唱给公木听。公木听后激动不已。郑律成乘机对公木说：“你是从前方来的，经历过战地生活，让我们携手合作，为八路军而歌唱吧！”当时，很受群众欢迎的，由冼星海、光未然二人作的《黄河大合唱》刚刚演出过，使他们很受启发。经过认真研究，二人决定写一部《八路军大合唱》。二人配合默契。仅用一周时间，公木便一气呵成地写出了《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炮兵歌》、《骑兵歌》和《军民一家》等七首歌词。每写出一首，郑律成便迅即谱曲，加上谱成的《子夜岗兵颂》共八首。他们把这词曲俱全的《八路军大合唱》油印出来，郑律成亲自到各连队去教唱。很快地，“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歌声回响在抗大校园，回响在宝塔山下，回响在延河之滨，回响在敌后各根据地。其中

的《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得到军委政治部的批准，发表在《八路军杂志》上，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1940年，萧三、公木、刘御、师田手、海稜等人发起并成立了延安诗社，开展街头诗和朗诵诗活动，编印了《新诗歌》小报。在这一期间，公木突遭婚变。翌年，调任军直政治部文艺室主任，主编《部队文艺》杂志，还成立了以发展部队文艺创作为宗旨的有30多人参加的文艺社团鹰社。延安使公木这位“业余诗人”的才华得到了施展的天地。1941年9月，他在《我爱诗》（后改为《我爱》）中写道：“什么生命力最久常？什么光照得最深最强？是你啊，我心爱的诗。……我爱过多少男人和女人，我却没有像爱你这般深。”这表达了他对诗怀有如此真挚、深沉的情感。这一时期，他置身于革命斗争的前列，视野更加开阔，创作题材更加广泛，对美好、光明的事物的追求和赞颂，对腐朽、黑暗势力的揭露和谴责，成为这一时期创作的中心主题。1941年冬写成初稿，1943年春定稿的长篇叙事诗《乌枪的故事》是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在长诗中，他通过对一家祖孙三代农民在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的欺压下的悲惨命运的描写，展示了一幅旧中国农民悲惨的历史画卷。它和《岢岚谣》的问世为解放区叙事诗的创作起到了引路作用。

1942年5月，延安文艺界整风开始。公木接到毛泽东主席和凯丰同志联署的请柬，于5月2日前往中共中央办公楼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当他来到会议大厅门口时，看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正在一一与前来参加会议的代表亲切握手。当介绍到公木是《八路军大合唱》的歌词作者时，毛泽东同志微笑着紧紧地握住公木的手说：“好啊！希望你们多写些反映兵的作品。”会上，他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讲话，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使在“大众化”问题上纠正了头脑中潜在的“化大众”的偏向。整风后，1942年9月，公木被调到鲁迅艺术文学

院文学系任教。这期间，由于创作上的丰收，加上不断研究、总结，公木在诗歌理论上有了新的认识，形成了新的观念，由“原先的‘旧形式（民歌体）、新形式（自由体）’发展而为‘新歌诗、新诵诗’”。所谓“新歌诗”是指“一切供伴乐歌唱的诗篇，包括民歌、歌词及所有按谱填词或先有词然后作谱的作品”；所谓“新诵诗”是指“一切供阅读朗诵的诗篇，包括自由体、格律体及所有摆脱了音乐而纯属语言艺术的作品”。从此以后，公木的诗歌创作便基本上是在这种理性认识指导下的结晶。在这期间，公木对旧体诗词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他说：“不再像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样绝对化、片面性了，这不仅是由于接受了整风教育，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参加了以萧三同志为核心的新诗歌会，并通过它接触到延安五老诸先辈的怀安诗社，体认到了古典诗词也能反映现实，服务抗战。”此时的公木在创作实践上主要还是从事新诗歌的创作。

1944年秋，公木和天蓝赴南泥湾访问。是年冬，又与鲁艺戏音系的孟波、刘炽、于蓝、唐荣枚等人赴绥德地区下乡闹秧歌，并采录民歌。这一期间，他在诗歌创作上更加有意识地向陕北民歌学习，相继创作了《十里盐湾》等诗篇以及长诗《共产党引我上青天》。后来，他与何其芳合作，把采集的民歌加以整理，编成了《陕北民歌选》（1948年8月由光华书店出版）。

四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党中央决定由延安大学派一批骨干力量去东北创办新型的东北大学，为东北根据地培养革命和建设人才。这支建校队伍因战争受阻，在张家口参加华北联合大学工作。与此同时，中央还组成挺进东北干部

大队，其中有由鲁迅艺术学院师生为主体组成的东北文艺工作团（又名“第八中队”）。公木参加了由舒群和沙蒙为正、副团长的东北文艺工作团，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10月底到达沈阳。公木在行军途中作《出发》一诗：“我们是毛泽东撒出的火种，我们是毛泽东放射的光芒。翻越高山，涉渡深水，穿过无边的草原和森林，前进，前进，前进……把温暖送到最寒冷和所有一切寒冷的地方；让风雪的严冬，永不再临。”在这新的天地里，他满怀激情改写并创作了《东方红》歌词。《东方红》的诞生是有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的。1942年，陕北农民歌手李有源看到“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的标语，唤起灵感，第一次唱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1944年，李有源把当地农民响应政府“移民生产”的号召、创造新家园的内容填成六段词，命名为“移民歌”。1945年春，鲁艺秧歌队觉得《移民歌》第一段词很上口，内容又是歌颂人民领袖的，只是词太短，意犹未尽。大家议定请《八路军进行曲》歌词作者公木续写歌颂共产党、八路军的歌词。可是还没来得及写，日寇就宣告投降了。这次东北文艺工作团抵沈后，要开个祝捷大会，需要准备文艺节目，刘炽、王大化、严文井、田方和雷加等人议论把《移民歌》改名唱出去，又推公木执笔改写、填词。公木遂写出《东方红》四段歌词。第一段改李有源原词“谋生存”为“谋幸福”，使毛主席领导的革命目标更为远大。第二、三、四段全系公木创作。歌词定稿后，由刘炽在《骑白马》曲调的基础上略微加工处理便登台演唱了。《东方红》在沈阳公演后很快就传遍了全东北以至关内各大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公木改写和创作的三段歌词为准的《东方红》为开播曲。（第四段歌词因东北民主联军番号于1948年1月撤销而舍弃。）有些报刊在刊载《东方红》歌词时多署“李有源作词”，这就造成了许多人的误会。现在看来，《东方红》

的三段歌词毫无疑义是公木亲手创作和改写的。

1946年2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根据党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和创办东北大学的指示精神，决定在本溪市创办东北大学，派当时任本溪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公木和舒群、白希清等同志参加建校筹备工作。不久，东北局任命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张学思兼任校长，白希清和舒群为副校长，公木为教育长。实际上，从筹建到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均由公木负责。建校初期，公木率领东北大学数百名师生在解放战争的硝烟炮火中，边行军，边宣传，边学习，从本溪到丹东、通化、梅河口、吉林、长春、哈尔滨，于6月1日到达佳木斯，辗转东北三省，行程1500千米，历经千辛万险。5月23日，从长春北撤的队伍在丁家园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先后有5名同学牺牲。此后，下乡参加土改斗争中又有2名同学壮烈牺牲。一年后，在佳木斯举行的追悼会上，公木满怀激情地致悼词：“英雄的血，烈士的血，交相辉映，把东大的旗帜染得鲜红，这是东大的光荣传统，亲爱的同学，光荣归于你们！”“英雄的血，烈士的血，洒向苦难的祖国大地，这血不是白流的。它撒在哪里，哪里就埋下仇恨的种子，哪里就开放灿烂的自由的花朵。”

1946年8月，由张如心率领的延安大学建校队伍到达佳木斯，加强了东北大学的领导力量，充实了教师队伍，壮大了学校的阵容。1948年3月，吉林市第二次解放，东北大学由佳木斯迁回吉林市，与我党在1946年创办的吉林大学合校。1949年7月再迁至长春，原东北大学（沈阳）、长春大学、长白师范学院同时并入，使东北大学成为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所高等学府。1950年4月，东北大学更名为东北师范大学，开始向新型正规化师范大学过渡。公木在担任副教务长、教育学院院长和二部、三部主任等职务的同时，还主讲中国革命问题、战后国际问题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等政治课程，为中文系讲授历代诗选等文学课